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道教

笔记小说研究

黄 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周: 叶叶叶叶
叶叶叶叶: 叶叶叶叶
平: 叶叶叶叶

道教

笔记小说研究

◎ 黄 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 白(特邀) 吴雨时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翼虎书装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 黄勇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614-3880-0

I. 道… II. 黄… III. 道教-影响-笔记小说-文学研
究-中国-古代 IV. I207.41 B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847 号

书名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著 者	黄 勇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3880-0/I·351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5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陈爱民 卿希泰 项 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骁	王挺之	王东杰	文富德	石 坚
左卫民	冉光荣	刘亚丁	杜肯堂	何一民
李小北	李天德	李 刚	陈国弟	张晓舟
杨天宏	杨 江	赵昌文	教 凡	徐开来
徐玖平	唐 成	唐 磊	曹顺庆	黄宗贤
黄金辉	隗瀛涛	蒋永穆	潘显一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是中国最早一批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四川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历程。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包容、开放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开设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个系中，除了更多地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西大学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而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

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年5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迅速迈向国内史学界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儁（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麀（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4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道教笔记小说概述	(21)
第一节 道教笔记小说概念的确定	(21)
第二节 道教笔记小说的研究范围	(31)
第三节 道教笔记小说的分类	(34)
第四节 道教笔记小说与道教的关系	(38)
第三章 济世体道教笔记小说	(42)
第一节 救世思想：济世小说的思想原型	(42)
第二节 济世小说的主题类别	(48)
第三节 济世小说的宗教意蕴与文学特征	(78)
第四章 修道体道教笔记小说	(82)
第一节 修道思想：修道小说的思想原型	(82)
第二节 修道小说的主题类别	(93)
第三节 修道小说的双重取向及其美学特征	(121)
第五章 游仙体道教笔记小说	(127)
第一节 仙境思想：游仙小说的思想原型	(127)
第二节 游仙小说的主题类别	(139)
第三节 “游”的宗教化与游仙小说的审美追求	(173)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第六章 谪仙体道教笔记小说·····	(182)
第一节 谪世思想：谪仙小说的思想原型·····	(182)
第二节 谪仙小说的主题类别·····	(188)
第三节 谪仙小说的宗教旨趣与文学价值·····	(205)
第七章 辅教体道教笔记小说·····	(210)
第一节 崇道思想：辅教小说的思想原型·····	(210)
第二节 辅教小说的主题类别·····	(219)
第三节 辅教小说的宗教功能与文学价值·····	(244)
结论·····	(249)
余论·····	(256)
参考文献·····	(264)
后记·····	(275)

第一章 导 言

—

材料乃学术研究之资粮。所谓学术研究无非是对材料的蒐集、整理、分析、综合、研究与发明，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必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因此，材料的选择，材料范围的确定，新材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 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求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 王、陈二公之说诚为的论。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乃至改变学术发展潮流的例子在在皆是。汉代孔壁藏书出，经学遂有今古文的分化；晋代汲冢古书出，三代禅让的古史观遂发生动摇；宋代金石收藏的繁荣，遂有金石学之兴起。近世以降，地不爱宝，新材料蜂拥而出，各类新学问亦随之鹊起。鸣沙石室的开启，安阳殷墟的发掘，西域、荆楚等地简牍、帛书的出土，遂使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成为举世共知的显学。受新材料倍出的影响及西来学术观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点的刺激，近世学界对材料的重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学中甚至出现了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异趋分殊，^①“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亦曾流行一时，傅斯年先生甚至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史家最重要的工作。^②姑且不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③抑或马克思所谓“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④的观点是否允当，泛历史学的“大史学”是否能涵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仅就材料与各种学科的关系而言，学问必自材料出，则是不刊之鸿论。

大而观之，作为学术研究基石的材料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传世文献材料。此类材料向来是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材料来源，在许多研究中，它甚至是构建学术大厦的唯一基石。其二为地下发现的新材料。自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此类材料对学术研究之影响日隆。由于此类材料往往隐没数千年，不为历代学者所见，加之往往又是其所处时代之信物，所以一经发现即可使学者发千年不发之覆，其对学术研究之震撼力最大。其三为田野调查所得的材料。19世纪人类学等现代学科兴起以后，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以求更为真实贴切地了解古今各种文化事项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学者广泛采用，这种得自田野调查的材料遂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且其地位还有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上升趋势。田野调查法虽然是现代新兴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是，正如发现于地下的材料并不必待现代考古学兴起也有可能获得一样，在田野调查法出现之前，从田野中获取材料也是一些学者经

①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第363页。

②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常采用的方法，如司马迁为作《五帝本纪》，“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广采各地长老“称黄帝、尧、舜之处”以与“古文”相印证，^① 就可以说是一种“田野调查”，只不过太史公的“田野调查”还只是一种简单的收集野闻逸事性质的初级工作，还没有上升为科学的方法论。

材料固然重要，然而对材料的运用才是学术研究中最为紧要的事情。在运用既有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中，要数王国维先生“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② 的“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最大。王国维先生说：“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③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④ 尽管“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界曾轰动一时，然而，近年来已有人对此种方法提出质疑。^⑤ 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以

①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页。司马迁自实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记载还见《太史公自序》、《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信陵君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郤滕灌列传》、《封禅书》等篇。此种采集材料的方法虽然不能等同于今日之田野调查法，但自“田野”中获取材料的做法却与田野调查法并无二致。古今论太史公遍涉江海，“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多从“壮游养气”的角度着眼，惟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谓：“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触及了司马迁著书的方法论问题。参阅郑之洪：《史记文献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第63～65页。

②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1页。

④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⑤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文献材料、考古材料、田野调查材料相参合的所谓“三重证据法”，^①而且有许多学者也正在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工作。但是，“三重证据法”却并未能像当年的“二重证据法”那样，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两种理论的不同命运说明，对材料的盲目崇拜，对运用材料的方法的迷信，在现今学术界已经逐渐有所淡化，无论是哪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因为传世文献承载的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形成又往往为特殊的历史心性所左右。^②那么，这种历史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文化的本真面貌，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按照福柯的观点，“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③那么，作为知识载体的所谓文献材料也就无非是“权力”借助监狱、法庭、警察、军队等强力手段进行的杜撰。正是基于这一点，一部二十四史也曾被诟病为“帝王家谱”。^④因此，使用此类材料进行研究就更加是一项必须慎之又慎的工作。

考古材料固然更真实地保存了本真的古代文化信息，但是，这种偶然发现的“样本”，在统计学意义上又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也仍然是值得细细推敲思量的。更何况许多新发现的地下材料虽然于今为古，但对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而言也仍然是“今”。在由古而“今”的过程中，它所承载的信息也难免被扭曲。

① 葛兆光：《文献、理论、研究者——关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及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二章《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北），2001年。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1998年，第17页。

西人所创的田野调查法固然是一种缜密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也不无相合之处。但是，自今日之“野人”求得的“礼”，是否就真的能帮助我们还原已经坠失的往古之“礼”，也仍需存疑。这种通过田野调查寻求古文化“残存”，并以之印证、复原古代历史的方法，其预设性前提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发展一般具有连续性，且有规律可循。然而，这种看似科学的理论预设的合理性早已受到质疑。19世纪以来曾盛极一时的单线进化思想日渐遭受冷遇，甚至被否弃，即其明证。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纯物质的自然界，社会发展中更多的似乎不是连续，而是断裂。^①因此，以田野调查法研究古代文化，终究不是一条坦途，在研究道路上必然有许多不可避免的陷阱。

既然各类材料均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那么，古代文化研究岂不成了无米之炊？其实，这要看我们怎样看待这项研究。如果研究目的是要复原真实的历史，那么我想这项研究所获得的结果终归是一座空中楼阁。毕竟，时间不可能倒转，逝去的历史也不可能重现，无论我们使用多么缜密的方法，多么坚实的材料，我们还原的历史也仍然只是在观念世界中制造出的海市蜃楼。如果放弃对还原所谓“真实历史”的执著，那么，我们从各种材料中抽绎出的海市蜃楼也仍然有其价值所在，也仍然不失为一道值得称许的学术景观。海市蜃楼虽然只是一种空幻的影像，但是它毕竟有着来自大地上的真实原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古代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一项观察海市蜃楼的奇妙活动，而我们观察到的海市蜃楼也不过是我们所择取的材料映射到观念的天空中形成的奇瑰影像。正因为我们永远不

^①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一章《引言》，三联书店，1998年，第1～19页。

|| ■ 道教笔记小说研究

可能穷尽所有的材料，海市蜃楼也不可能呈现出大地上的所有景观，而且，我们择取的材料如果本身就有问题，那么海市蜃楼中呈现出的影像对大地上的真实原型的扭曲就更大，因此，如何择取材料，择取什么样的材料，对学术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选择同样的材料，由于研究者目力与主观情志的不同，观察到的海市蜃楼也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以本书所要研究的道教为例，面对大致相同的材料范围，有些学者得出了道教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放弃自我，乃至不断屈服的结论，^① 有些学者却在为道教的纯正性进行辩护。^② 由此可见，主观因素对客观研究的影响是多么难以避免，这恐怕也正是克罗齐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由之所在。不过，只要在研究工作中理性不被情绪化的感性好恶所羁绊，那么，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主观色彩就可以看做是研究者个性的体现，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既然材料对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那么，选择材料当是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首要之务。职是之故，在本书即将开始的道教研究中，我们对材料范围的选择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本书的取材范围仍然是传世的文献材料，也即前文所说的第一类材料。此类材料一直都是道教研究中最主要的材料来源。但是，在以往的道教研究中，研究者更多采用的是道教经典和各类正统的文献材料，而小说这一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文化价值的文献材料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弥补这一缺憾，本书拟以小说为主要研究材料，以期为道教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从小说的角度对道教做一次新观察，通过小说材料来映射寓存于“大地”之上的道教文化景观。

①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② 龚鹏程：《道教的性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二

今日流行的小说观念基本上是西来的。近人以西方小说观看中国古代小说，往往不免感到失望。郑振铎先生就曾感慨道：“据我个人近来读那些小说的结果，对于中国小说的若干种是感到异常失望的。好的作品实在太少了！然而有的人也许不相信这话，而欲更费许多功夫去读这种无量数的劣等作品。”^① 针对这种以西方小说之“履”范中国小说之“足”的偏见，罗志田先生辩解道：“我们今日属于‘文学’的‘小说’概念基本是西来的，此前的中国传统中，小说与史的关系原甚密切。自班固一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小说就连在一起成为习语；也即因此，小说家向列四部分类的子部，而人之不疑。西方小说概念引入后，疑问也随即出现：郑振铎在1922年就质疑‘中国的书目’说，‘最奇怪的是子部中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谈’、‘杂志’、‘杂识’之类的笔记。’其实郑氏所谓‘真正的小说’乃是西来的新见，那时才开始喧宾夺主，此后终渐成为正宗。”^② 既然中国固有之“小说”已被西来之“小说”喧宾夺主，那么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样的呢？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但是作为一种文类，小说则正式形成于刘歆的《七略》。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所谓小说不过是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的民间野闻趣说。由此可见，小说反映的其实是民间的生活情事、观念、信仰之类

① 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② 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2辑，第262～263页。